

名

家

简

传

书

系

MING JIA JIAN ZHUAN SHU

XI

● 陈福康 著

郑振铎

5.6

7/1



中国华侨出版社

● 文学大家简传书系

郑振铎

陈福康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CFK/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郑振铎/陈福康著.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6.8

(名家简传书系/李犁耘主编)

ISBN 7-80120-120-5

I. 郑… I. 陈… II. 郑振铎-传记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15362 号

● **名家简传书系**

郑振铎

主 编/李犁耘

著 者/陈福康

责任编辑/吕 莺

装帧设计/李呈修

版式设计/林 达

责任校对/雷一平

经 销/新华书店总店

印 刷/北京市通县燕山印刷厂印刷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6.875 字数/155 千

版 次/1997 年 4 月第 1 版 199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

邮政编码:100028

东里 77 号楼底商 5 号

ISBN 7-80120-120-5/K · 16

定 价:10.40 元

目 录

第一章	童年艰辛	(1)
第二章	“五四”风暴中	(10)
第三章	事业的发端	(25)
第四章	帮助朋友	(39)
第五章	无辜者的血	(51)
第六章	被迫出国	(65)
第七章	重整旗鼓	(76)
第八章	“南迅北铎”	(90)
第九章	丰硕的成果	(105)
第十章	重返上海	(116)
第十一章	“孤岛”砥柱	(131)
第十二章	抢救文献	(142)
第十三章	最后一课后	(153)
第十四章	民主斗士	(165)
第十五章	全生命贡献	(178)
第十六章	建设新中国	(191)
第十七章	永生的凤凰	(204)

第一章 童年艰辛

清光绪 24 年，也就是“戊戌变法”发生与惨败的那一年，十一月初七，一个男婴降生于浙江永嘉（今温州市）。那一天，公历是 1898 年 12 月 19 日。

孩子的父亲叫郑庆咸，母亲叫郭宝娟。他们都很年轻，只有十八、九岁。孩子的祖父郑承晟（字允屏，号绍平），这年也才四十来岁。祖母姓陈，比祖父大三岁。祖父给长孙取了个名字，叫“振铎”。他就是本书的传主。

郑家祖籍是福建省长乐县的首占村。大约在郑振铎出生前三年，祖父为投靠表亲而将家从福州迁到温州。据说，表亲在温州当道台（这是一个省以下、府以上的级别不低的官儿）。祖父便在道台手下当幕友，在衙门内做做文书工作，官衔只是“从九品”。又据说，还曾被委派为某海岛的海防小官。

祖父共生有三男三女。长男即郑庆咸；二男名庆晋，比庆咸小一岁，大概很年轻时就死了。三男名庆豫，字莲蕃，约比

庆咸小九岁，曾赴西班牙留学，归国后在北京外交部任金事等职。三个女儿今都不知名字。据说长女嫁福州陈家，而陈家在云南大理任知府；二女嫁福州李家。三女生下不久即送给人家当养女。从长女的婚配和三男的留洋来看，早先这个家庭的经济景况应该是很富裕的；但不知是什么原因，又很快落破，竟至将小女儿也送了人。

祖父又为长孙取了个小名，叫“木官”。那是因为算命先生根据他的“八字”算下来“五行缺木”。这当然是民间迷信。但是，祖父为他正式取名“振铎”，则是有寓意的。“铎”是古代的一种大铃，“振铎”即摇铃发出号召的意思。他又字“警民”（一作“铎民”），与名相应，都有“唤醒民众”的积极意思。他出生于“戊戌变法”那一年，长大后又曾从家里看到过《新民丛报》、《黄帝魂》等书刊。我们可以猜想，他的祖父应该是一位具有维新救国思想的知识分子。

他出生两年后，大妹绮绣出世。再过六年，又有了小妹文英。他本来还有一个小弟弟，可惜不幸在襁褓中夭亡。多年以后，他在一首《死了的小弟弟》的小诗中沉痛地写道：“虽然我们只见了五六面，/但是这初生婴孩的最后的哑而不扬的哭声，/至今还使我负着悲哀的重担。”

1945年，他在为自己购藏的一部清人贺君召的《扬州东园题咏》题跋时，曾写道：“余幼客扬州二载，尝游法海寺。”他童年时，怎么又会到离温州有千里之远的扬州去客居二年呢？根据他的大妹绮绣的回忆，再结合他小妹文英的印象，我们才得知在这短短一句话中，正隐含有一个十分悲惨的故事。

原来，他的父亲年轻时也与祖父一样，千里迢迢离家去扬州当幕友。有一天，偶然在县衙门的后花园中，看到知县的小妾，觉得很像自己的妹妹，心里产生疑问。后经打听，证实果

然正是家里早先送给人家的小妹妹。顿时，父亲思想上受到巨大刺激，悲愤难言，精神便有些错乱。后来越来越严重，家人接回温州，治疗无效而病逝。父亲得病那年，大概是1906年，因为文英便是这年生于扬州的。据她说，她虚龄四岁那年，父亲便死了；那么，那时他也只有十一、二岁，而他母亲只有三十来岁！

父亲病逝后，祖父肩上的担子更沉重了。为了摆脱愁闷，祖父常常喝酒。但是，这种浅盏独酌、借酒浇愁的日子未能维持多久，祖父也郁郁而亡了。这样家里更为贫困。三十几岁的寡母，上要侍候同样守寡的婆婆，下要拉扯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其艰难是可想而知的！这是一位坚强的母亲，她凭着自己的双手帮人家缝缝洗洗，来挣点微薄的收入。逢年过节，还做些玩具拿出去卖。木官的三叔留学回国后，在外交部当个小京官，有时寄点钱来帮助寡母及寡嫂的生活。多年以后，我们的传主在他的一部未写完的长篇小说《向光明去》中，就融化进自己童年的生活：

他父亲死得很早，……他之能由小学而中学而大学地一步步上去读书，其费用完全由他母亲东借西挪，卖田集会来的。他母亲对他属望极深，差不多全个性命都寄托在他的身上。他因此也很能刻苦用功。有一次，他坐在方桌上读《赤壁赋》，他母亲在旁一针一针地把另碎的花缎，做成各式各样的禽鸟野兽，或青蛙之类，这是他母亲最擅长的手工艺，许多亲戚都极赞许她。针篮中已经有十几只了，她还在不停不息地做着。他问道：“妈呀，今年做这许多香袋有什么用？”他母亲抬起憔悴的双眼，脸色青白得可怕，颧骨高高地突出，凝视着他，良久地才答道：“你七姨要几

只，还要送几只给你五姊的保官、清官。”

“但是还有那许多呢？他们两家只要七八只够了。”

他母亲踌躇地缓慢地说道：“那几只是拿出来卖给洋货店的。叶妈说，他们要买，可出两角小洋一只。”

仲芳想不到他母亲要如此地工作着度日，不禁得放下了书，走到他母亲膝前，把头伏在她膝上哽咽地哭了。良久，觉得头发上有冰凉的水点滴着，他抬头看他母亲，她的泪水也如两行珠串般地不自禁地落下。

“只要你好好地读书上进，我受什么苦都可以。”她把仲芳抱在胸前，如她在十几年前抱他一样，柔和而感动地说。

可以看出，这段催人泪下的描写，不是完全虚构的，正是作者自己的经历。他在后来写的《压岁钱》等小说中，也反映了童年时家庭的艰苦状况。鲁迅在《呐喊》一书的《自序》中说得好：“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童年的木官，不正是经历了这样的生活道路吗？鲁迅小时候，因为避难，曾到乡下外婆家住过一段时间，使他有接触到更贫困的底层农民的悲苦生活，留下毕生难忘的印象。不知什么原因，童年的木官也曾一度生活在农民中。他在30年代写的论文《玄鸟篇》中，就有这样一段自述：

著者童年时，那时已经是在民国初元了——曾有一个时期居住在农民之间。农民们常苦于横征暴赋，叹息于兵戈的扰乱不息。当夏天，夕阳下了山，群星熠熠地明灭于天空，农民们吃过了晚饭，端了木凳，坐在谷场上，嘴里

衔着旱烟管，眼望在茫茫无际的天空时，他们便往往若有所思地指点着格外明亮的一颗星道：“喏喏，皇帝星出来了，听说落在西方呢。真命天子出来，天下便有救了。”

母亲最大的心愿，是要木官“好好读书上进”。在极度拮据的情况下，她宁愿自己饿肚子，熬夜做工，也要让木官得到求学的机会。据说，他最初是在县城陞潭一家私塾里读书。不久，转入永嘉高等小学。小学的校长兼教师黄筱泉，是一位勤勤恳恳教书育人的老师，儿子炎甫也是木官的同学。同学中还有一位比木官小一、二岁的夏承焘，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词学专家。筱泉老师原是旧式科举出身，但却不是冬烘先生，很注意吸收新思想，更新自己的知识和教育方式。

高小读完，预备考中学，木官和炎甫等几个同学在一所庙宇里天天补习迎考，又由筱泉老师亲自辅导。木官觉得在这些强化补习的日子里，他的语文水平进步得最快。虽然十分紧张，却感到分外快乐。他一直记忆着这段难忘的日子。二十年后，当他已成为著名教授时，在一次外出旅游的火车上，还写了一篇《记黄筱泉先生》，深情地说：“我永远不能忘记了黄筱泉先生。他是那样的和蔼，忠厚，热心，善诱。”“我第一次有了一位不可怕而可爱的老师。这对于我爱读书的癖性的养成是很有关系的。”而当年同学夏承焘，在1978年写的一首悼念他的《减字木兰花》中，也曾温馨地回忆起一同跟从筱泉老师学习的难忘的往事：

峥嵘头角，犹记黄门初放学。池草飞霞，梦路还应绕永嘉。

“池草”，指春草池，“飞霞”指飞霞洞，均为温州著名古迹。而“峥嵘头角”，则是说小木官当时已显示出他的聪明才气了。

大概是为了省一点学费，或是为今后能早一点找一份工作以帮助家里吧，他在1911年春考取了一所职业中学——温州府官立中等农业学堂。木官是该校第一批招收的新生。但该校缺乏必要的师资及设备，教师上课又不得法，学了一年没有学到什么。因此，部分学生自动转学，木官便转考入浙江第十中学校（在温州）。那大概是1913年秋。这所学校，在当地很有点名气（今改名温州中学，仍是浙省名牌中学），是由著名教育家孙诒让创办的。木官那一届学生，共有122名，可见规模实在不小。该校条件要比原先那所农业学堂好多了，所以求知欲极强的木官才转到了这里。但这时他家里的经济状况则更窘迫了，据说有好几次因为交不起学费，校方竟不准他参加考试。

这时的同班同学中，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的，有高觉敷（心理学家），而他当时最要好的同学，是陈闳憩（召南）。召南的三哥闳慧（仲陶），也是他们的高年级同学。而仲陶、召南的父亲陈寿宸（万公），号意园老人，原是清末举人，博学多才，工诗词，擅书法，辞官家居，课徒为生，辛亥革命后应聘任第十中学国文教习。因此，他与陈家父子为师友之交，特别接近。

他这时已爱书如命，但无钱买书，好在他家与陈家甚近，陈家是书香门第，每当放学后与节假日，常去陈家借书看，或倚立书橱旁翻阅。他借到一本好书后，常常做详细的笔记。有时甚至还整本整本地抄录下来。他后来说：“我在念中学的时候，就喜欢念历史。”他还说：“余素喜治流略之学。童稚时，即手录《汉书艺文志》及《隋书经籍志》，时自省览。”

他更爱读文学作品，尤其是洋溢着爱国思想的优秀作品。他也在这时开始尝试文学创作。他后来说：

年十三四时，读《聊斋志异》，便习写狐鬼之事。记得尝作笔记盈半册，皆灯前月下闻之于前辈长者的记载。迄未敢出示友朋。人亦无知之者。几经播迁，皆荡为云烟矣。后随长者们作诗钟。方解平仄，乃亦喜赋咏物小词。随作随弃，也不复存稿。

陈寿宸老师是有功力的老诗人。他“随长者们作诗钟”，主要就是跟寿宸老师吧？可惜这些作品都没有保存下来。

他还开始注意研究古代文学理论。他后来回忆说，“曾向一位同学那里，借过一部《文心雕龙》，在暑假里抄了一遍”。《文心雕龙》是我国古代最辉煌而有体系的文艺理论专著，共五十篇，约五、六万字；如果加上注释，字数就更多。抄录一遍，实在是一种刻苦的学习。还有一部卷帙浩瀚的《古今文综》，他当时也做过大量抄录。1957年，已经是中央文化部副部长的他，在北京旧书店里忽然见到这部书，当即购下，携归家中后激动地写下一段跋识：

1915年予在温州十中肄业，此书方出，一陈姓同学购得之。予健羨无已，乃假得之，穷一暑天之力，尽录其中论文之作，集为二册，题曰《论文集要》，殆是我从事纂集工作之始。今经四十余年矣，此二册钞本尚存行篋。顷过中国书店，见架上有此书，乃购之归，因追记少年时代一段艰苦求书之事实。

这段题跋中说的年份，当是1916年。因为这部书上印着“丙辰孟春中华书局钁版”。“一陈姓同学”，当即是召南，或是

仲陶。这部书共四十册，售价十元（这对当时的他来说，是一笔大数目），收入了很多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名篇。他在当年花一暑假之力抄录这类文章，不仅是他“从事纂集工作之始”，而且也是他将来要成为著名文学评论家的预示。

更应该提到的是，小小年纪的他，已经开始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大事了。在少年时，他先是怀着好奇之心，偷偷翻看祖父购藏的《黄帝魂》、《浙江潮》、《新民丛报》等宣传民族革命的书刊。虽然，有的已是好几年前出版的，但他仍然越看越激动，读过不止一遍。上中学后，陈老师家里所藏的几本梁启超的书等，他都曾仔细地读过，并与仲陶等同学交流过读后感。他只觉得有一股澎湃的热血在他的心胸中震荡。章太炎、邹容、孙中山、梁启超、谭嗣同、陈天华等等，还有索子（鲁迅当时的笔名），这些作者的名字对他有着强烈的吸引力。他后来说：“我们在少年时候，便以读《黄帝魂》、《浙江潮》一类的书为乐。‘雪夜读禁书’，公认为‘人生一乐’。”这说的当然是辛亥革命以前的事了。

而在中学时期，他最爱看的是上海群益书社1915年创刊的《青年杂志》。第二年，该刊改名《新青年》。所发表的李大钊（守常）先生的《青年》等文，虽然短，但他觉得比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要耐读。这里面有新的东西。而在1917年的头上，他连续读到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等文，更觉得新鲜和兴奋。他朦朦胧胧地感到，这些似乎是一个新的时代的“前夜”的光景。他当时当然不会想到，不久自己也会成为这样的“新青年”，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冲锋陷阵的战士。

就在1917年春天，他读了整整六年中学，终于毕业了。他想马上找一份工作，以减轻可怜的母亲的负担。当然，他也很

想继续上学，求取更多的知识和思想上的光明。不料，他的母亲早已想好了。她宁愿自己咬咬牙再多吃几年苦，也要让她的木官继续读书上进。她牢牢记着丈夫与公公临终的遗愿，她知道自己的木官是个有出息的孩子。

“木官，上北京去读书，去找你三叔……”她含着热泪，嘱咐自己的儿子。

第二章 “五四”风暴中

他在1917年底参加了交通部北京铁路管理学校(今北方交通大学的前身)高等科的招生考试。而他当时的兴趣实在是在文史方面，为什么不去考文科大学呢？原来，他的三叔，尤其是婶婶，缺少慷慨大度的心肠。当时，文科院校的费用都很昂贵，读完大学需花去一笔相当可观的钱。所以他们主张他报考铁路管理学校，因为这所学校不仅学费低，而且毕业后的职业又有保证，被称为“铁饭碗”。就这样，最初读过农业中学的他，这回又考工科大学了。

铁路管理学校是清政府于1909年设立的最早出现在中国大地上的十所高校之一，初名铁路管理传习所，一年前刚分为铁路管理学校和邮电学校两所学校，这时铁路管理学校新添“英文高等科乙班”，招收六十名学生，增聘教员十余名，专授铁路管理课程，大多用英文教授，学制三年。这实际是铁路管理学校改名后自招新生的第一班。当时，报考的人很多，竞争

相当激烈。1918年1月5日公布录取名单，他考上了！

但学校里教的专业技术知识，远远不能满足他的求知欲。他除了要叔叔向外交部的图书馆借些书来看以外，又找到了一个好去处——附近的米市大街金鱼胡同口的北京基督教青年会。里面有一个小小的图书馆，有七八个玻璃橱的书，其中以社会学方面的书，和俄国文学名著的英译本为最多。他不是会员，但可以去看书。他几乎天天去那儿。最初，他读那些西方关于社会学的原版书。书中提到的种种社会问题和解决方法，引起他深深的思考。

青年会干事、美国人步济时，立即注意了这位青年人。因为步济时不只是一般的教会人士，而且还是一位社会学家。“你还可以读读这些俄国文学名著”，有一次步济时向他推荐。果然，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高尔基的短篇小说，契诃夫、安特列夫的戏曲与小说等等，一下子深深地吸引了他。

俄罗斯文学，真是形象的社会学著作。这个在深沉地思索、坚韧地斗争着的伟大民族的文学作品，震撼了他的心灵。在他眼前，好像新开了一扇面向大海的窗，由那窗口看到了美丽的朝晖、蔚蓝的海天、澎湃壮阔的波涛、风云变幻的奇景。这是他从来没有梦见的。正如鲁迅后来说的：“那时就知道了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因为从那里面，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醉辛，的挣扎；还和40年代的作品一同烧起希望，和60年代的作品一同感到悲哀。我们岂不知道那时的大俄罗斯帝国也正在侵略中国，然而从文学里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两种的：压迫者和被压迫者！”

差不多同时，他又在《新青年》杂志上读到了鲁迅先生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灵魂更受到巨大的震颤。鲁迅巧妙地通过“狂人”的疯话，用象征、隐喻的手法，一语双关地

寄寓了他完全能够领略和战斗的深意。他想大声跟着喊：“救救孩子！”他要加入到踹翻那四千年“吃人”的“陈年流水簿子”的战士的队伍中去！他同时也为鲁迅的白话新文学作品的艺术魅力深深吸引住了。

在这个小小的阅览室中，他还经常碰到也来看书的脸色白白的、手指因吸烟而染得黄黄的瞿秋白，还有矮矮胖胖的耿匡（济之），另外还有面容清瘦的瞿世英（菊农）。秋白和济之都是俄文专修学校的学生，都只比他小一、二个月。菊农要比他小二岁，但排起“辈份”来却是秋白的远房“堂叔”。菊农是汇文学校（一所教会大学，后与他校合并组成燕京大学）的学生。他们都爱好文学，又都关心国是，因此谈起来十分投机。

1919年5月4日，星期天。午饭后，他在家略为阖眼休息了一会，便被外面一片叫喊声惊醒了。急忙翻身下床到外面，只见东面近处的上空，正翻腾着浓黑的烟，夹着血红的火焰，突突地向上冒着。他这时自然不会知道，这一天，“五四运动”的伟炬点燃了，中国现代革命史的第一页从此开启了！

第二天学校的同学激动地议论这件事，他又看了报纸，才知其详。他深深地为爱国运动的爆发而激奋；同时又为自己学校因较“小”而未被通知参加昨天的活动而感到遗憾。他与同学们商量后，便立即赶到北京大学，参加了当天组织起来的“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他作为铁路管理学校的代表，积极参加了发表宣言、援救被捕同学等活动。那天晚上，他回到叔叔家，已经是中夜了。好久，好久，才敲开了门。“老爷、太太好不着急呢！怎么到这时候才回来？”老妈子睡眼朦胧地问。他一句话也没说，摸进自己的房间，点亮了如豆的油灯，默默地回想这一天的事，心里充满了激动和义愤。

第二天一早，叔叔便跑来责问他为什么那么晚才回家，并

再三要他“不要多管闲事”。吃早饭时，婶婶又要他今天别出去，千万不要和“闹事”的学生混在一起。他们还郑重地说：“木官，你要想想你妈妈，千辛万苦抚养你成人，又再三托我们照管你。要是你出了事，你妈妈将怎样……？”

他低着头，一声不吭。但他眼前却浮现了他的因忧愁和苦作而早老的母亲的面容。啊，亲爱的妈妈，我怎么会忘了您呢？我平时发奋读书，并不想为自己如何如何，倒是想让您将来不再过冻饿的生活。但是，请您原谅儿子吧。他现在正因一种更伟大的光明的目的，似乎真的要把他亲爱的妈妈暂时忘记了……他默默地想着，很快吃完了早饭。他的胸中沸腾着青年的勇敢和自觉。这种勇敢和自觉曾经时时因他的母亲而燃起；而现在，却为另一个更大的目的而燃起了。乘着叔叔婶婶不注意，他又一溜烟地跑出门外，到北大去了。

学生代表天天开会。秋白、济之、菊农也都分别做了各自学校的代表。当然，在这个大运动中，青年学生们的思想和态度，也不是自始至终完全一致的。他后来回忆说：“我们有辩论，有斗争，有说服，有打击，有协商，我们的政治工作是复杂而严肃的。其中也显得出有‘封建性’的‘门户’，像在‘学生联合会’里，北京大学和高师就是两‘派’。不过反帝、反封建的主题，却是以万钧之力领导着大家向前走，总的方向和总的口号是一致的，是能泯灭了一切不同的意见的。我们几个人代表的都是小单位，而且在那些单位里，做工作十分困难，群众意见多，领导不起来，特别是我几乎成了‘单干’。我们这一群代表着‘俄专’、‘汇文’和‘铁路管理’的便在一起，成了一个小单位，主要的原因是平常见面多，比较熟悉，因之，在开会、活动时也就常常在一起了。”在这无形中形成的“小集团”中，秋白显得很老练，常常一边抽烟一边说出比其他人成熟、深刻